



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Problematic in The Theory of History

胡亚军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Problematic in The Theory of History

胡亚军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 胡亚军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482 - 0470 - 1

I. ①历… II. ①胡… III. ①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5393 号

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胡亚军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蔡红华 王 磊

装帧设计: 夏雪梅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7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470 - 1

定 价: 20.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E - mail: market@ynup.com

序言：在极端情形下的思考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著作，最终目的是要说明“我们如何认识历史”这个传统问题；同时，它也是一本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因为它涉及“历史实在”、“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经典问题。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因为在这本书里，解决历史认识论、历史哲学等问题的主要工具是“问题结构”这一概念，而我相信，问题结构作为一种普遍的认识方式、理解模型、理想模型，具有广泛的认识论意义，它不但可以运用在历史学领域中，也能运用到其他哲学著作——其实在很多学科领域中我们都能看到问题结构的影子。

历史认识论这个词，在严格意义上是单纯词而非合成词。尽管我们可以说，历史认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与康德认识论有莫大的关系，甚至也可以理解为认识论转向——从认识的对象转向认识的主体——在历史领域的一种独特表现，但是，从认识对象这个角度来看，历史认识论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以人类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科学，区别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一，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对象，既独立于研究者又将研究者揽入怀抱，认识历史的人总是要在历史之外、历史之间摇摆不定，作为一种科学认识要求认

识者独立客观地置身事外，可是研究者的情绪、方法、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却来自于历史本身。其二，认识历史需要研究者的主观建构。或许其他科学没有像历史认识论那样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主观建构，身处当下的研究者要尽量科学地跨越时间限制，描述不可再来的过去，因此，历史研究者总是面临一个困境：既要给大家诉说一个谁都没有见过、听过的过去，又希望这种叙述能具有一种科学性和客观性。

而我相信，“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这个概念是解决历史认识论面临困境的一个有效解决方式：只要我们确定了一个认识对象，同时也就确定了一个理论假设，从这个理论假设就能够得到一系列推论。所谓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其实就是确定认识对象时所做的一系列假设和推论。另一方面，问题结构既体现了历史认识论应当具有的客观性，一旦问题结构确定，那么这个历史理论所具有的理论要素、无法涉及的领域和理论“失明”也就是客观的，它和选择问题结构的研究者再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结构也表明了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性质，作为理论预设，每个时代之中研究者的问题结构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气息，在需要历史史料做支撑的年代，人们习惯假定历史具有连续性；在一个强调改革、需要摆脱历史脐带和牵绊的年代，人们偏爱假设历史是断裂的，非连续的。在本书中，我建构出了两种问题结构：连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间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这个概念也可以为讨论历史哲学提供一些线索。一般而言，历史哲学包含三个方面的知识：历史的形而上学讨论历史实在；历史的价值论或意义论需要讨论何谓历史意义、历史意义感如何产生；历史认识论要谈论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关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的关系我们已经提及。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相关问题与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有关，本书认为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是一种相

对假设，而历史实在则是一种绝对假设，这一区别是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理论的分水岭；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历史理论如何界定历史意义，在连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中，历史的意义来自于历史目的论，而在间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中，历史是被消解掉的。

最后，问题结构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认识论意义。简单地说，问题结构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在很多科学领域得到运用，我所做的，只是特意将这种方法提出来并加以规范。比如，问题结构在西美尔那里偏向于说明研究者具有的主观价值标准；在韦伯那里理解为一种社会学和法学研究的“理想模型”；而在阿尔都塞那里，问题结构则倾向于说明理论著作的思维框架对已有内容的渗透作用，以及对该理论界限的划定。症候式阅读的目的就是找到著作的问题结构，并以此来发现著作提出了什么问题，无法提出的问题即他所说的理论空白。

由于问题结构作为一个概念，必然具有思维的抽象性。科学的思维抽象，本身意味着一种思想的暴力，它是人们在精神中对现实进行的解剖和肢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思维假定了一种（或几种）极端的情形：从 a、b、c、d、e、f 的现实对象中抽象出共有的 A 特征。这种极端性的思考一方面表现在，抽象 A 是现实对象的对立面而不与之发生任何关联，它是现实对象的共性却不独属于任何一个现实对象，我们在抽象的属性中看不见任何感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仅仅抽取出 A 特征，而抛弃了一切。基于此，问题结构也表现了一种极端情形下的思考。

二

在开始漫长而苦涩的阅读之前，我应该用平缓轻松的语

调为读者陈述一下自己写作的目的，或者说，可以放心地使用一些形容词和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来描述自己写作的初衷。在正文，读者将会发现，整个行文的语句几乎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感慨，没有形容词，我只能如此辩解：这或许就是严肃思考和逻辑带来的必然后果，是科学精神探索未知领域时付出的必然代价。进一步说，行文的晦涩有可能是作者故弄玄虚，也有可能是研究对象本身需要艰深的思维并使用简练、专业的术语，我希望自己的情况属于后者。另一方面，选择干枯而又单一的表述方式来自于一种警觉：在充满人文气息和令人愉悦的辞藻背后，作者使用的文字为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不利于表达的准确性。同时，那些在名词前多义的形容词，往往代表着形象生动的对比、生活中类推等方法的使用，而这些方法恰恰是最不可靠的方法，同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和神秘主义入侵科学思想的最佳路径，在这种情形之下，需要得到认真研究的对象可能在类比、类推中被日常知识所取代。比如，在出台《物权法》时所引起的广泛争议中就有这么一种值得一驳的观点：《物权法》的出台是为了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众所周知，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是这种平等的一种体现，“就占有人财产推定合法的制度而言，更是一项不言而喻的社会生活准则，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推定其社会成员所占有的财产为合法”^①。这种表达中，“神圣”、“人人平等”等人文主义美好词汇逃避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属性（辞藻惯有的神圣性给论述对象赋予了不可侵犯、不可讨论的特权），没有区分私有财产是日常生活的生活必需品，还是窃取共有财产如公共生产资料之后披上私有外衣的个人财产，于是后一种情况就可以逃离批判的目

① 孙沛成：《物权法：诠释与过度诠释》，载《读书》2008年第9期。

光。解释者或许会辩解道，法律不对财产原初取得的方式加以追究，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倡导偷窃和强占的法律，也和“人人平等”自相矛盾，因为原初情形下的获取财产行为，依然受到律制或道德性法律的约束。况且，从社会生活中的“人人平等”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私有财产也应当平等地接受法律保护”，因为人的平等不能只依靠财产来维系，也不能仅仅借助对财产的平等保护来体现；“不言而喻”、“任何”、“推定”等词汇的使用则透露出当下中国学者的自大与肤浅，以及赤裸裸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立场：既然“我”已经占有了私有财产就必须得证明它是合法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论证方式，“不言而喻”等词汇是掩盖理论漏洞的最佳方式，遇上诘难就以此作为回应。从更高层面来看，这种观点透露了历史知识和历史感的缺乏，法律从来都只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衍生品，在历史剧烈变动时期（如革命时期），没有人会“推定”自己的财产必然合法。辩解者或许会说，“我们”只谈非革命时期的情况——这种安逸的、小资式的认真真是一种可笑自我安慰，因为社会变化从未停止，财产的合法与否的标准，也没有真正固定过，守着自己怀中的那点私产并假装用学术语言来论证其合法性，最佳的途径莫过于用“推定”来幻想一种物权法的永恒性。这种矛盾恰恰暴露出来：假如永恒神圣的私产真的不言而喻，那么我们为何没有和这种永恒性相匹配的法律？原因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不言而喻的私有财产；假如就占有人财产推定为合法是一项不言而喻的社会生活准则，那我们为何多此一举来将生活准则上升为法律？原因更简单，这种“推定”纯粹是一种幻想，就像资本家及其附庸学者总是喜欢幻想资本存在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甚至在神话传说中。总之，“任何”社会必然存在资本（财产私人所有制），他们就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收集尘埃中有利于自己预先得出的结论的证据，这

样就可以论证自己是“合法”的了^①。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理论叙述以抽象的概念为出发点，讲究逻辑推演的严肃性，这势必造成理论在表达形式上会远离生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人类特有的理论思维在内涵上远离生活，恰恰相反，用严肃的概念体系来阐述人类艰深、劳累的思索，正是人类尊严的一种体现。人的生命脆弱如芦苇，但人的确是能够进行思维的芦苇。以上权当是自己所作的一点辩护。

三

这本书体现了一种“在极端情形下”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我在书中把“我们如何认识历史”这个老问题推向两个极端，即历史要么是连续的，要么就是间断的。或者说，我个人人为地把各种相关的观点归类为两种对立的阵营，把各种“辩证”、“综合”的观点中的理论要素剥离出来，放在我建构出来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思维模式（问题结构）中。需要作出说明的是，其一，以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历史认识论问题，仅是众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在于一种理论上的“便利”。其二，历史是连续的或是间断的，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极端假设，现实中的历史认识，总是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的”。我们还是不要急着进入本书的主题。

还是看看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极端思维方式吧。“一公升开水和两公升开水，谁冷得快？”这个问题一般人很难回答。“一滴开水和一公升开水，谁冷得快？”略加思考，从常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1页。

识中或许就可以得到正确结论，一滴开水冷得快。其实，这种常识体现了伯格曼法则：体积越大，降温越慢，所以往往寒冷地区人的体格要大于热带地区，以便保持体温。都是日常体验，都是对温度的感受，但是为何从后一种情况我们能够较为容易地得到正确结论？原因在于，我们把重量之间的差距在思维中推向极端，与其讨论一公升和两公升的差别，不如扩大到一滴水和一公升水。

“你将来打算干什么？这辈子你想做什么？”这是些很难让人轻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还能活一个星期，你想干什么？”则会马上得到快速回答。之所以容易回答后面这个问题，原因同样是把时间差距推向极端，把遥遥无期的人生历程转换为短短的一个星期。

以上两个例子，无非在表明一个事实：在极端情形下思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事情本身温温吞吞，理解起来，这样可以，那样也可以，很难对事情本身作出明确判断。此时，在思维中将事情本身的可能性推向极端，设想和构造出事情发展的两种极端可能性，然后，把事情本身和它的两种极端可能性作比较，反而更容易理解事情本身。

在极端情形下思考，涉及方法论问题，还是举例说明为妙。比如，我们在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时，老于世故的人会说，“一方面，人性是善的，另一方面，人性也可以说是恶的”。乍一看这个结论，没什么大错，却也难让人信服。如果用极端的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其过程是：第一步，假设人性是恶的，即人性中恶的一面推向极端，认为所有个人的本性皆恶。然后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一系列结论，比如霍布斯的“人和人之间像狼和狼一样”的观点，以及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都可以看做人性恶这个极端假设的推论。第二步，假设人性是善的，即把人性中善的一面推向极端，

假定每个人的本性一开始都存在所谓的“善端”。然后，从这个假设出发，我们就能解释许多论点。第三步骤，在明确了人性善与恶的两个极端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现实的人生，所谓人性有善也有恶的说法，才能站得住脚，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模糊、复杂与多变。

在这种意义上，探究人们在极端情形下思考中的固定模式，分析这些模式中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工作更像是人类学家做的事情。列维—施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详尽分析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不同民族图纹、歌曲、萨满舞蹈中的体现，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不同民族习俗之中隐藏着特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我只是延续了他的研究路径，但是，研究的对象转换成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各种观点中隐含着的一种二元对立思维结构，即认识历史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问题结构”，两个思维历史的极限，区别之处在于我更加细致地探讨了这两种极限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这里暂不深谈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较为轻松地看一看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是怎样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继续试着从一些影视作品、日常语言中粗线条地挖掘出、提炼出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及构成要素。在这里我只能粗线条地谈谈，认真地分析这些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问题结构”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它应当成为人类学家和精神学家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而我目前的兴趣在历史认识论这个领域中。

四

在各国、各民族漫长的文学史中，精灵、鬼怪、仙人、魔鬼、超能力的英雄、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作为人的对立面反复出现。无论这些文学角色具体形象和个性如何，都可以归结为“非人的”角色，他们都不是凡人。到了现代，这样

的非人的角色又多出了两个：克隆人和机器人。克隆人（机器人）反复出现在当代文学、影视作品中是一种非常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仅从“极端情形下思考”的立场进行大概的分析。

作为我们“人”的肉身，假如克隆人独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的行为甚至思维方式，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突和对抗，我们的道德伦理受到强烈的质疑：具有人的肉身（机器人只不过人类肉体的延伸而已）是否就应当给予人的权利？这种情节为何反复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道德尺度是否是评价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尺度？人是否有权力统治具有生命特征的对象？其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地方是，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克隆人（机器人）带给我们的冲击和疑问，来自于它们的存在：是我们“人类”把它们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物质形态上它们作为我们的镜子而独立存在，同时，这种人为产物的存在显露了人类极端的思维方式：人性如此复杂，伦理道德如此多变，人认识自己困难重重。那么，一种较为便利的方式便是跳出人的肉体来看待自己，跳出人类社会来看待人类，于是，所谓人肉身的克隆人（机器人）的出现最适合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首先，克隆人（机器人）仅仅只是碳水化合物而已，严格意义上只是物品；其次，如果克隆人（机器人）具备了其他动物没有的、独属于人的特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它们当人来看待。

这样一来，“人如何认识自己”转变为思考人和克隆人（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内心抽象的冲突展现为外在现实的冲突，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人—克隆人（机器人）”这个二元对立中得到解决。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在思考自身之时面临了困境，在各种判断之中出现了迷惑，那么把人类自身的某些人性——仅仅是某些人性——赋予克隆人（机器人），

把我们自身复杂的问题，切割下来放到克隆人（机器人）身上，树立一个对立面，各种问题反而变得好讨论些。

这就可以理解，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具有肉身的克隆人（机器人），在某种情形下具备了几种人特有的属性，要么是爱情，要么是怜悯或者其他“人性”。必须指出，克隆人（机器人）只能具备一种或几种人性而不是所有的人性，否则，我们将无法区分对方，我们在思维中把人性的几个方面推向极端、制造一个对立物来认识自己的方法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克隆人（机器人）反复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是人类在极端情形下的一种思考，具有肉身的克隆人（机器人）实质上只是我们反思自己的一个载体而已，它们只是一种人性，或者是几种人性的载体。同样的情节是人面对克隆人（机器人）造成的冲突而迷惑不已，其实，他所迷惑的仍旧是，人到底是何物？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人何以在万物中显得尊贵？这些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现在借助克隆人（机器人）再次提到台面上了。

五

在谈论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在同一个问题上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历史是否具有连贯性这个问题上，一种声音说：历史就像奔腾的河流那样宏大，从未间断过，同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断经历各种时期，向前走去；另一种声音则反驳：历史总是不断地出现断层，宝贵的文化、科技、精神成果往往被人为地阻断，历史往往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同样类似的问题是，历史是由劳动大众创造的，还是由历史英雄人物改变的？在前者看来，历史的内在脉络是人类的的生产实践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精神产物，进行日常生产的自然是劳动者，历史的创造者是劳动大众是合乎事实的。

在后者看来，所谓历史发展，意味着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变，一种特质的历史时期从原先的母体中脱颖而出，而让历史产生如此巨变的人，必然是能力超群、优于大众的少数个人及历史英雄，他们改变了历史走向，自然也就创造了历史。类似彼此冲突的观点很多，不胜枚举。

甚至在以何种方式来描述、解释历史之时，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宏大叙事的视野，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应当从一种普遍、抽象的价值尺度或者规律来评价。在人类走向某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宗教性世界末日，也可以是哲学上的最高的人性，还可以是政治学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是否和这个目的发生关系，成为衡量行为、事件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如此一来，很多时候，个人的生命历程及行为并不具有历史意义。有历史意义的，是人类的目的，是超出日常生活的普遍价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历史由个人、具体事件组成，那么叙述的出发点应当放在那些唯一的、具体的个人和事件上——这些对象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无需在这些具体对象上来找其他标准和尺度对它们进行衡量。因此，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表现为对个人生活经历的记述、某些人物的回忆，在这些个体之上依稀看见、感受到历史的宏大就足矣了。

以上各种冲突观点，对其中任何一对矛盾观点进行深入的分析，甚至仅仅对一种观点进行学理性地研究，都是一本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我的兴趣不在于简单地对它们进行评价和梳理，我希望从这些观点中跳出来。

我要做的事情，是要从这些种种观点中找到它们共同涉及的一个原初问题，这个原初问题必须是对诸多观点中要素的归纳和抽象。然后，从这个原初问题开始，一步步推演出一系列结论。这个原初问题是否科学，一方面取决于原初问题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结

论对诸多观点的解释力和涵盖力。

经过努力，我得到的原初问题是：历史是连续性的还是非连续性的（间断性的）。这个原初问题可以涵盖很多彼此矛盾的观点和理论，但是这样还不够，我必须进一步将这个原初性问题概念化，把这个问题加工成为一个由各个要素组成的概念：问题结构。

也就是说，我把人们看待历史的两种方式——历史是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抽象为认识历史的两种问题结构，即两种认识历史的模式。第一种问题结构我冠名为“连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第二种问题结构称为“间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

按照刚才的说法，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要检验这种问题结构的科学性。

“连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的科学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问题结构的要素包含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不间断的历史主体两个假设，从这两个假设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历史发展存在目的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等结论。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结构以及推论构成的体系，可以有效地解释或涵盖一些历史理论，如历史进步论和循环论、历史目的论、历史意义，等等。

“间断性历史理论的问题结构”的科学性也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问题结构的要素包含不超过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跨度（短暂的历史时间）、不同的历史主体。从这两个假设中我们可以推导出历史发展没有目的，没有历史目的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结构以及推论构成的体系，可以解释或者涵盖一些历史理论，如历史中的英雄（个人历史传记）、历史断裂说，等等。

毋庸讳言，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是在各种历史理论之“上”建构出更为抽象的理论框架。这种工作任务决定了

我的描述只能是抽象的，同时也是粗略的，因为我不能过多地停留在某一个具体历史理论的内容里面。因此，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来自这个方面的批评。

六

既然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极端的思维方式，并可从各种纷杂现象中提炼出两种极端的倾向，那么，在理论中，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其实，在极端情形下思考，就是建构一种特殊的理想模型（ideal type）。模型建构的方法在很多学科中得到运用，经济学家构建数学模型，社会学家假设纯粹的最小单位的社会细胞，马克思谈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其基本特点就是在思维中“剔除”各种不重要的因素，保留一些理论者认为重要的要素，探究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知道，这种理论模型的建构，只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有效方法，模型本身并不真实存在，它只是我们在思维中“构建”出来的。

然而，在极端情形下思考，进而构建理想模型，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理想模型中，我们不但要从现实中提炼出各个要素进而分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用这些要素勾勒出事物原型的、可能的、相反的边界。通过理想模型找到事物的可能的极限——这样做的理论意义在于，明确事物发展的两个可能方向和深度，探究在两个相反界限之内事物的真正状态。这样一来，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一种新的表达：在理论上我们将思维推向极端，构造出这个事物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得到两种相反的特征；在现实中，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它的可能性与特征，其实都处于理论提供给我们的两个极限之间。此时，理论自身科学性的一种验证方法，就是看其所建构的理论框架能否提供一个适度

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空间由两个极限构成，真实对象与这个理论框架的契合程度，以及理论框架对真实对象的解释力，成为评价理论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

设想一种极端情况或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可以同时再设想另一种相反的情况，这是另一种思维方式：时间有无尽头？人性是善或者恶？历史是连续或者间断？等等，这在哲学领域被称作“二元对立”。在我看来，“二元对立”一词不应当被界定为贬义，而应当是中性的。毕竟，如黑格尔所说，分析要先于综合，我们应当先将对象的各种属性、构成部分在思想中“肢解”开，剥离出来，研究单个构成部分和要素的性质，然后，才可能综合这些要素的性质，进而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在极端情形下思考，首要的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出对象的两个属性或构成要素，然后才能放弃极端的思维方式，走向对象本身。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地认识身边的事物，乃至整个世界，这是禅宗的“顿悟”、神秘主义的体验。真理，只能一步步地靠近。

在本书中，我通过一个问题将自己逼上一种绝境，将自己放置于一种极端情形，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历史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而我解决的步骤和方式是，第一步，将这个问题归类为认识论问题，并建构出我们在理论中认识历史的特有模式即理论的“问题结构”，描述“问题结构”特有的一些特征；第二步，假设人类历史是连续的，那么，可以从这个假设出发来探讨相应的“问题结构”具备何种特征，从这个假设（问题结构）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观点，一方面，这些观点严格地从假设中推导出来，因而保证了假设（问题结构）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可靠性。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应当尽可能地涵盖目前对历史的各种理解，这可以保障我所做的假设（问题结构）的适用范围；第三步，假设人类历史是间断的，那么，这种认识历史的方式必然同样隐含了一种